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
评传丛书

总主编 张一兵 执行主编 丁帆

戴光中 著

赵树理评传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
评传丛书

赵树理评传

戴光中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总主编 张一兵
执行主编 丁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树理评传 / 戴光中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

ISBN 978 - 7 - 305 - 10824 - 2

I . ①赵… II . ①戴… III . ①赵树理(1906~1970)
-评传 IV .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5632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 健
丛 书 名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
书 名 赵树理评传
著 者 戴光中
责任编辑 陆蕊含 编辑热线 025 - 83686643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28 字数 335 千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0824 - 2
定 价 70.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

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刘再复 袁伟时 葛剑雄 董 健

总主编 张一兵

执行主编 丁 帆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帆 王一川 王中忱 王彬彬

叶兆言 田本相 朱晓进 孙 郁

吴义勤 吴为山 张一兵 张 法

陈思和 郑也夫 胡 明 徐兴无

蒋述卓 曾华鹏 温儒敏 赖永海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是教育部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酝酿多年的一个课题计划,它的主旨就是要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认识现代社会以来中国文化在极其复杂的语境下是怎样孵化出一大批文人名流的窗口,从而回到历史的现场,更真切地从历史的脉络和缝隙中识别那个时代的文化真实,体悟那个时代里名人的心路历程。

近三十年来,海内外陆续出版了许多文化名人的传记和评论著作,可谓十分繁多,其中亦不乏可圈可点之佳作。但总起来说,其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要么就是注重文本的传记特征,凸显其文学性,而淡化了史料性和学术性;要么就是从纯学术性入手,只注重对传主遗留文字内涵的学术性发掘与剖析,而忽略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揣摩,对其工作与生活事件的叙述以及对文本艺术性和文学性的追求。从技术层面上来看,这似乎只是个体例问题,其实它关乎的却是文化理念以及方法运用等宏观统摄的大问题。

我们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关于怎样在大量的史料基础上完成评与传的问题,尤其是传的部分,如何运用合理的“历史的想象力”,应该是每一个学者应该持有的基本价值立场。

当“历史是一个被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成为许多历史学家回避历史真实性的遮羞布时,当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成为史学界治史的箴言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历史一次次被歪曲的悲剧。我们是一个不缺

乏历史教育的国度，但是，我们的历史教育往往是建立在充满着过度丰富的“历史的想象力”之中的，实用政治对历史学的干预往往建立在夸张、扭曲、变形和虚构的基础之上，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人对历史的误读——远离历史的真实成为一种历史的常态，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十分清楚，历史是永远不可能“还原”和“复原”的，但是，尽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最最基本的学术道德底线。然而，这个底线为什么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次又一次被突破呢？实用历史的观念把历史学推向了深渊。曾几何时，对秦始皇的过分褒扬而掩盖其非人性的残酷一面，无非是为彼时的专制制度树碑；对各朝各代法家的歌颂无非是为维护其专制统治而立传；对成吉思汗穷兵黩武的膜拜无非是为人类“兽性”张目，因而，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文学抒情，却成为史学界的治学指南时，注定会产生历史学教育的悲剧结局。同样，对辛亥革命的由贬到褒的过度阐释，片面地追求“历史的想象力”，也正是体现了史学界实用主义的治学理念，倘若这种理念不改变，我们的历史学教育仍然会沿着错误的道路滑行。即便是并不遥远的现代史，涂抹历史的记忆也同样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我们认为，“历史的想象力”应该建立在丰富的史料公开的基础之上，它应该是照亮历史幽暗处的一束光线，使其成为更加光明的原动力；它更应该是填补历史细节不足的润滑剂，成为使其更加丰满起来的驱动力。它不能建立在凭空想象的基础上，没有坚实的史料作为基础，没有基本史实作为实证的依据，就不能抵达历史真实性的彼岸，只有在实证加合乎逻辑的想象前提下，才能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的原态。

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谈“历史的想象力”，可能会有许多古往今来的事例可举，只一部《红楼梦》就足以证明它在文学艺术中的生命力所在。

但是我想举证的恰恰是 20 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学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滥用“历史的想象力”的弊端。

自台港文学中的武侠历史小说流入大陆以后，效仿戏说历史的风潮开始蔓延，作为一种消遣休闲文学，这似乎是无可指责的创作方法。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事实：许多喝着这样的文学奶汁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居然将那些虚构出来的人物故事当作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来阅读，尤其是在这个人文意识日趋淡薄、工具理性日益发达的时代，那些只希望在“快餐”中获得和完成人文教育的人，是无视历史学和消遣文学之间的界限的，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文学教育和历史教育的悲哀。

如今的历史题材创作已经到了不戏说和不杜撰历史就不能成书的地步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家们对于那种需要查阅大量史料，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有凭有据地发挥“历史的想象力”的功夫已经失去了耐心，那种“十年磨一剑”、“二十年磨一剑”、“一辈子磨一剑”的严肃创作态度已然被消费文化时代的“快餐”制作法所取代，谁还愿意穷几十年的皓首来“磨铁杵”呢？传统意义上的历史题材的严谨创作已不复存在，为弄清楚一个历史细节花费巨大精力的创作将会成为历史。不知道这是文学的幸还是不幸呢？！

从没有“历史的想象力”到过度的“历史的想象力”，我们的历史和文学走过的道路并不曲折，但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看到的结局。我们需要的是贴近历史原态的价值理念，所以，我们希望这套丛书成为一个运用合理的“历史的想象力”的典范。

本着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原则，我们在准备编纂这套丛书时，就明确要求作者将“传”与“评”尽可能完美地结合。所谓“传”，是作者以叙事的方法再现传主的生活历程；所谓“评”，是作者直接站出来阐释、论说

传主的人生意义与文化成就。做到在真实可靠的史料考察基础之上,既具备叙事的文学魅力,又不失清晰的学术剖析。我们充分注意到了本套丛书的受众面——既要为少数文化研究者提供可资参考的史料和学术视野,同时也要兼顾广大文化和文学爱好者拜视文化名人的嗜好,为文化普及做好基础工作。因为我们深知,无论是专业研究,还是业余爱好,一旦失去了其趣味性,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一个“自由王国”境界的。所以,我们倡导在严谨的叙述中,避开那种繁琐考证和过多纠缠于枝节问题的写法,力图着眼于大事件和传主之间的勾连,以及传主行状与时代思潮之间的关联性,以此来勾勒与构筑传主在历史现场的真实存在。

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文化消费的时代,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是守成主义者,固守拒绝任何想象的传统“评传”写法,摈弃一切文学的想象和合理的推论。但是,我们绝不提倡那种以出卖传主隐私而获得名利的商业性炒作,反对那种“演化”的写法。因此,本丛书的编撰原则就十分清楚了,广大读者也可从中看出某种端倪。

为了丰富本丛书史料的直观性,我们要求作者尽可能提供一些有关传主的图像资料,内容包括生活照、手稿、书影等等。其目的就是在严肃的学术性观照中增加历史现场感,同时给书籍的装帧增添一些活泼的色彩,融学术性与艺术性为一体。

丛书将会以成熟一批出版一批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其中多属新制原创,少量是旧著修订新版,我们也将在此过程中不断改进和不断完善,将这一套丛书做成一流品位的文化书籍。我们相信,有众多高水平作者的支持,有广大高品位读者的呵护,有一个高要求的编委会以及出版单位的努力与支持,这套丛书一定会达到预期的目标。

丛书编委会

2012年1月

目 录

001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
018 / 第二章	独特的教育
042 / 第三章	发动学潮
068 / 第四章	荷戟独彷徨
093 / 第五章	投身抗日
116 / 第六章	小报天地大
146 / 第七章	小二黑与李有才
167 / 第八章	“李家庄”的变迁
195 / 第九章	“赵树理方向”
221 / 第十章	邪不压正
241 / 第十一章	“水土不服”
269 / 第十二章	《三里湾》
291 / 第十三章	青年问题
315 / 第十四章	“神经病”
347 / 第十五章	再认识
370 / 第十六章	“中间人物”
391 / 第十七章	“死于《十里店》”
409 / 第十八章	“社会自有公论”
433 / 后记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 |

只消稍微仔细地检阅一下赵树理的家世，便可发现一个有趣的事
实：这位以农民代言人而著称于世的大作家，祖上并不是握锄头操犁杖
的，至少，上溯七八代，“仕宦之家”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

在苍茫太行山的主峰处，有一个人口不足十万的“蕞尔小县”——山
西省沁水县。赵家就祖祖辈辈居住在该县东南方的武安城（即今之武安
村）。关于这个地名的来历，有明代诗人李梦阳的《武安城》一诗可以
说明：

孤城突如块，据山瞰流水。

谁敢经营之，无奈秦白起。

东北远长平，遙遙数十里。

想是击赵时，卜此御旌垒。

鸣鼓收降旗，一坑万人死。

.....

进爵食武安，声名播青史。

迄今千百年，此城名尚尔。

沁水县七山二水一分地，人稀土瘠，地僻岩深，山无珍奇之产，水无鱼盐之利。但据县志记载，“沁乃彬彬文物之邦也，山川秀气萃于斯文，鸣珂曳佩之士接踵相望，制科以来，甲第蝉联，后先辉映”。其中便有赵树理的高祖钟恩、钟勋兄弟。他俩一个弄文，一个习武，经过若干年的寒窗发奋，终于在那“乾隆盛世”分别挣得了太学生和武举人的花翎顶戴。可是不知何故，这两个新贵却跑到与武安村隔河相望的尉迟村去大兴土木，各自建造了两进三层有数十间房屋的官宅，坐北朝南，黑漆大门，这在偏僻的山村里，俨然一家显赫的门庭了，人们尊敬地称之为“东院”、“西院”。

韶光流逝，斗转星移。到了 19 世纪 70 年代，赵树理的祖父忠方公长大时，这个家庭衰败中落了。他不独成了令人既珍重又忧虑的单丁，而且，尽管颇通文墨，却与功名无缘，屡次应试都名落孙山，连个秀才也没有捞到。

光绪初年，一场千古罕见的大旱灾，席卷了上党大地。红日当空，寸云不生，瞭望原野，遍地不毛。“金贱粟贵，土地器皿皆成无用之物，守物而饿死者不可胜数。市面粮价日夜涨一至十倍，一切稗谷糠粃犹作奇货可居，虽玉米空棒子每斤亦索价六文。童男少女弃毙盈野，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不但房屋土地欲变卖糊口无买主，虽少女幼妇欲舍身为生者亦无敢领者。饿死人十分之五六，活者割死人之肉而食之。”^①

^① 转引自《沁水县志》所收的《丁丑奇荒记》，《中村荒政碑》。

这场灾荒使赵家陷入了山穷水尽、忍饥挨饿的窘境。赵忠方时年二十三岁，已是个一表人才、满腹经纶的小主人了。但他毫无孔乙己式的自尊和懒惰，勇于改变自己的地位，他脱下长衫，穿上短衣，跟随同乡到河南商丘县的一家杂货铺当伙计去了。

在那里，这位被家人百般爱护的少爷，低三下四地向顾客献殷勤，晕头转向地同杂货打交道。好在文盲遍野的穷乡僻壤中，像他这样能断文识字的伙计毕竟如凤毛麟角，不可多得。他很快就被擢升为账房先生。

山西人素来善做生意，在江湖上有个不大雅观然而颇为传神的外号——“牛皮灯笼”。意思是说，外面黑，心里亮。也是山西人的薄一波，曾不无自豪地向一个外国记者解释道：“从外表看来，他们胆小怕事，温顺腼腆。过去外地人都瞧不起他们，轻蔑地称他们为‘老西’。其实他们一点也不胆小，他们擅长经商，极有远见，遇事不是光图眼前一两年，而是为一辈子着想。自明朝以来，五百年间，山西帮控制了中国各地的钱庄银号。”^①赵忠方正是这种“牛皮灯笼”，为时不久，他就薄有积蓄了，使一家老小在这大灾之年免于饿死。

从此，他就在这家杂货铺里安顿下来，每隔两年探亲一次，同时也成亲一次，因为公婆很乐于折磨儿媳妇，对没能怀孕的更有置之死地而后快的癖好，所以他每次回家，总是见不到思念中的妻子，还得在父母的安排下为他们再娶一个牺牲品。这样的悲喜剧，直到 1884 年，他的第四个妻子生下了第一个儿子——也是唯一的一个——时才告结束。那一年，刚好是赵忠方的“而立之年”。三十得子，使他欣喜欲狂。但一事无成的悲哀却也悄悄地袭上了他的心头。在这位官宦之后的头脑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杂货铺终究不宜安身立命，他

^① 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 59 页。

毅然结束了颇足度日的商贾生涯，回归家乡，买地置产，并把尘封的四书五经搬出来放在案头，一面逗孩子，一面做八股，企图重温旧梦，走科举仕进之途，以告慰赵家祖宗的在天之灵。

然而，19世纪晚期的中国，整个地主阶级的封建王室已到了危如累卵的境地，那个至高无上的西太后，却还在想方设法加速它的灭亡。她一边对如狼似虎的列强作阿Q式的反抗，一边向忧国变法的“君子”无情地开刀，同时又不忘寻欢作乐，挪用建设海军的巨款去修造壮美的颐和园。等到这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百年逝去之后，代表着封建王朝晋升之阶的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了。因此，忠方公的美妙理想乃是一枕黄粱，而且家道也衰败到无法靠地租度日，必须由儿子赵和清亲自去耕种仅有的十六亩土地的境地了。幸好沁水的风尚是读书人一向“居乡朴直，不务公事，不喜奔竞”，而赵忠方又笃信“万事由命不由人”的格言，所以对于科场失意和经济地位下降到自耕农的变迁，他都能泰然置之、随遇而安。

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赵忠方是独生子，儿子赵和清也是独生子，而第三代的第一个，竟然是个女孩子。气得这个乐善好施的赵忠方拼命虐待儿媳妇，他不能不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忧心忡忡。如果赵家从此绝后，他以何颜去见九泉之下的列祖列宗啊！因此，1906年9月24日那天，当赵树理用洪亮的哭声宣告自己降临人世时，一家老少的喜悦简直无可名状，唯有感谢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上苍。神像前顿时红烛高燃，香烟缭绕。得意洋洋的祖父向跪着磕头谢恩的老伴和正在全神贯注地掐算生辰八字的儿子宣布：这新生婴儿的小名就叫“得意”。

偏远山村，大都像个小小家族，遇到了敬神的事，亲戚邻里往往大伙攒凑一份香火来陪祭，名曰“邀神”。其时又正值传统的中秋佳节，太行

山上禾黍方登，瓜果皆熟。纯朴忠厚、慷慨豪放的乡亲们纷纷送来香烛和鸡蛋小米、西瓜月饼，欢庆新的生命，祝贺三代同堂。也许是这大团圆的欢乐气氛熏陶了尚在襁褓之中的小得意吧，因而他终身热爱大团圆，认为团圆是中国人民的审美规律，甚至希望热衷悲剧的外国人也来懂懂大团圆。

当赵树理成名后，他的家乡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在他生下百日时，家里为他庆贺“百岁”，特地在他面前摆了十几样玩意儿，任他抓，其中还有向人借来的银元宝，专摆在孩子的小手最容易触到的地方。可是赵树理偏不碰它，而是张开两只小手，一手抓过一支笔，一手抓过一根赶毛驴的鞭子。他的爷爷见此情景，长长地叹口气说，这孩子长大以后本应“金榜题名”，可惜错投在咱们贫寒之家，只能做个“驴背上的状元”。

赵树理出生以后，继之而来的又是三个妹妹，她们有如奇妙的砝码，不断地增加着赵树理在家庭天平中的重量，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得意”。全家老小对他施以过分精心的护理，竭力抑制儿童好动的天性，不准他私自越出祖传的“西院”围墙一步，只能和姐妹们进行众星捧月式的游戏，唯恐男孩子打闹戏斗、踢飞尥脚的顽皮劲会危及他的健康。这样的好心其实是十分愚蠢的。它使童年时代的赵树理长得好像一株成熟了的谷子：细长的身材看起来颇为单薄，一颗大脑袋老是若有所思地低垂着。苍白而瘦削的脸上，生着一双古潭似的黑眼睛，好像失去了儿童天真顽皮的神采。

这种不自然的过分爱的境遇，造成了小得意含蓄而内向的性格。他显得过于胆小、文弱，但是，他又不像类似的独苗那样既骄且横、说一不二，而是羞怯的，谦逊的。这样的品性，应当归因于家庭中浓厚的迷信色彩。

赵树理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期曾写过一个名为《神仙世界》的剧本。

仅以三百份油印本发行于晋东南平顺县，具体内容连作者本人也记不清了。但他写作此剧的灵感与内容得之于家乡的生活，看来是毋庸置疑的。

在这山野地方，历来是“敬神信巫，有不平必质之于神。故乡多庙祀，醮赛纷举”。一个小小的沁水县城，光是由官方祭祀的庙坛，就有先农坛、风云雷雨坛、舜坛、城隍庙、河神庙、马神庙、黑虎庙等二十四个，其他民间的庙宇更是星罗棋布在群山众村，难以计数。迷信思想犹如郁结在深岭巨壑中的瘴气毒雾，污染着世世代代生息在这里的人民的心灵，他们在吃奶的时候，就吸入了“举头三尺有神灵”的信念，“愚民恶俗，殊骇听闻”。有一位巡抚到此的大官，曾亲眼目睹妖巫治病的情景：只见妖巫用一柄利刃对准病人的肚皮，一面念念有词，满口咒语，一面就将匕首刺进病人的肚皮，不一会儿，病人流下一地的鲜血和肠子，抽搐着死了，而亲人仍要酬谢这个杀人妖巫。更有甚者，与沁水相邻的翼城东山里，人们都相信有一个东山大王，是要享受初夜权的，所以在新婚之夜，新娘必须被叔伯、兄弟等亲人按住，在众目睽睽之下让新郎畅所欲为，而“为”的时候，参观的人越多越好，因为人越多，东山大王就越害怕，新娘才能得以幸免……

赵树理在谈到家乡的迷信愚昧时曾沉痛地说：“抗战期间，日本人把我们的人压在茅坑里，青年人往外救，还要先问问阴阳先生。”

这一带形形色色的宗教会道门多如牛毛。它们各自以其荒唐怪诞的迷信仪式和来世报应的预言蛊惑百姓，广收门徒，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这种情况，由赵家可见一斑，他们所奉的宗教便呈三足鼎立之势。

祖父和祖母所信奉的，叫作“三圣教道会”。据说此会乃白莲教的一个遗支，曾组织农民暴动，遭到官府镇压，遂改了名称和宗旨。它的精义是一锅儒、释、道三教观念的大杂烩，认为“儒重忠恕，释重慈悲，道重感

应”，主张合三为一，劝人行善。其仪式也十分古怪：教徒要在桌子上排列九宫，一天烧香四次，必须常年吃斋，不食荤酒，否则要犯咒语，受到惩罚。赵树理自小接受祖父的教育，是个非正式教徒，故而到二十岁尚不知肉味，体内的动物脂肪等于零，落下了一副单薄的体质。

母亲王金莲及其娘家则是“清茶教”的虔诚信徒。这个怪道门的渊源已无人知晓，但其愚蠢无比的教规，赵树理在半个世纪之后还记得清清楚楚——“神在柜中，柜中放两半盆清水，清水上放筷，平时不开。教徒不用烟酒葱蒜。每天检查一次水缸，缸里若有什么东西，如蜘蛛等，认为是得罪了神。柜里的筷子受到震动开了叉，也认为是得罪了神”。

父亲赵和清，却是彻底迷信传统的阴阳卦术。这位“二诸葛”的原型人物能卜会算，抬手动脚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后来，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揭发过他的一件蠢事：

有一年春天大旱，直到阴历五月初三才下了四指雨。初四那天大家都抢着种地，二诸葛看了看历书，又掐算了一下说：“今日不宜栽种。”初五是端午，他历年不在端午这天做什么，又不曾种；初六倒是个黄道吉日，可惜地干了，虽然勉强把他的四亩谷子种上了，却没有出够一半。后来直到十五才下雨，别人家都在地里锄苗，二诸葛却领着两个孩子在地里补空子。邻家有个后生，吃饭时候在街上碰上二诸葛，便问道：“老汉！今天宜栽种不宜？”二诸葛翻了他一眼，扭转头返回去了，大家就嘻嘻哈哈传为笑谈。

这类宗教会道门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是带有政治色彩、反抗意味的秘密团体，另一派则是所谓“纯良”的“善教”，不牵涉政治，专门行善施福，助人为乐。赵家鼎足而立的三种教派之所以能互不干扰、相安无事，

大概就因为他们尽管各有各的教义戒律,但在“善”字上有着共同的语言,所以不必像洋教徒那样,一个家庭只容得下一种宗教。

在这种浓得化不开的迷信气氛中,赵树理不耳濡目染、深受陶冶便是怪事了。在他六岁时,祖父为他开蒙的读物,既不是五经四书,也不是常识国语,而是不伦不类的《三圣教道会经》。那位热衷卦术的父亲也不甘落后,先向他传授天干、地支、五行、八卦、六十四卦名,进一步便要他学习《百中经》、《玉匣记》、《增删卜易》、《麻衣神相》、《奇门遁甲》、《阴阳宅》等算命先生的经典著作。父子俩拼命往他小小的脑门里填塞玄妙的奇谈怪论。但事实证明,两位长辈如此卖力的言传身教,反而促使他日后成了一个最坚决、最彻底的反封建迷信的斗士,显然,这是两位长辈始料所万万不及的。不过,他俩似乎也应当感到欣慰,因为这种教育也决定性地培养了赵树理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品质。

在祖父的亲自指导下,童年时代的赵树理非常热心地用一种土办法来记录自己的善恶之行:做了好事就往一个罐子里放白豆,做了坏事放黑豆。比如,修桥补路放三颗白豆,掩埋尸体放两颗,敬惜字纸放一颗,坏事则除损人利己外,大都是封建迷信的不忠、不孝、不洗手就在祖宗牌位前上香之类。在赵树理的小罐中,白豆总是比黑豆多。

尽管此类规定把赵树理约束得胆小异常,见到蚂蚁都不敢碰,生怕犯了杀生罪,但我们还是应肯定那些可爱的黑白豆。它们使赵树理不知不觉地从溺爱中自拔出来,避免了骄娇二气,并且潜移默化着他的品性,使他得以终生保持乐善好施的习惯。他的儿子二湖记得,哪怕在备受摧残、行动失去自由的晚年,他也忘不了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比如,路上碰到一块绊脚的石头,定要设法搬走,以免别人再绊倒;遇见一个拖着鼻涕的小孩,便会掏出手绢替那个孩子擦去鼻涕,有时还给素不相识的拉屎的孩子擦屁股,为此他的身上总是带着空烟盒。